关注“今日灌云”微信公众号
掌上阅读《灌云报》

七色烟城：日本北九州的大气污染事件

北九州市是日本重要的工业城市，在历史上曾经汇聚了钢铁、电力、化学等高污染产业，可谓日本近代化与经济高速增长的领头羊。当时，北九州产业聚集区烟囱林立，天空中飘浮着七色烟尘，大气污染程度不断刷新日本纪录。从20世纪中叶开始，北九州市大气污染问题愈发严重，数以千计的居民患上哮喘，近海鱼虾绝迹，连大肠杆菌都不能存活，北九州也被列为“公害聚集区”，成为日本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被称为“七色烟城”。

辉煌工业带来严重的大气污染

从幕府时代末期到明治时代，日本积极引进西方技术，迅速走上工业化道路。1895年日本议会批准了建设自己的钢铁厂的议案，次年批准了建厂预算，日本国营钢铁厂正式立项。此时，北九州市是整个九州地区的交通重镇。当地有影响力的人物都相信引进钢铁厂将为北九州带来无法估量的好处，于是开始了积极的招揽游说活动。由于有港有煤，交通便利，最终日本第一座钢铁厂决定选址北九州。

1901年在北九州建成投产的国营八幡制铁所，启用了引进德国技术建造的第一座近代化高炉，也成为新日本制铁的前身。八幡制铁所建成投产，开启了北九州近代工业发展的序幕。但是，北九州在为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和繁荣立下汗马功劳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大气污染代价。1959年开始，北九州的降尘量连续高居日本首位，当时甚至流传着“北九州的麻雀都是黑的”。据北九州市官方资料记载，1963年，北九州市日平均降尘量为19.5kg/km²，污染最严重的城山地区达到75kg/km²，已经远超当时大气污染标准的最高值。1969年还曾拉响了烟雾警报，成为日本第一座发布烟雾警报的城市。

大气污染引发突出的社会问题

日益严重的大气污染不仅给北九州市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更是给当地居民生存带来严重灾难，使居民的健康生活面临严重威胁。调查显示，北九州地区的呼吸器官疾病患者人数明显增多，许多学校被迫迁移，许多学生也被迫转移。

面对日益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担心孩子健康的母亲们首先站了出来。1950年北九州地区的妇女协会对此进行了受害调查，不断向行政机构陈情，要求企业对污染排放进行治理，最终厂方被迫设置了集尘设施。1960年前后，在大学教授的指导下，她们再次进行了独立调查。最终，基于调查要求企业改善设备的提案在当地政府的协调下被企业接受。

母亲们发起的市民运动获得了公众的广泛支持。市民们自发组成众多的民间环保组织，以更加专业和更有效率的方式介入、监督和推动北九州地区的大气污染治理。媒体也很快加入进来，对北九州市的大气污染事件进行大量报道，一时间北九州的大气污染事件震惊世界。当时市民运动此起彼伏，持续近20年之久，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北九州大气污染事件的深刻启示

日本北九州市工业化带来的大气污染事件为人类敲响了警钟。以北九州的大气污染为鉴，我们应该认真吸取这次事件的教训，采取积极措施来减少大气污染，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大气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协同降碳和调整能源结构。《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23》显示，2022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达到54.1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2.9%。因此，减少大气污染需要在降碳和能源结构调整上着重发力。一是推行煤炭洗选加工，限制高硫分、高灰分煤炭的开采。新建煤矿应当同步建设配套的煤炭洗选设施，使煤炭的硫分、灰分含量达到规定标准。同时，已建成的煤矿，应当限期完成对煤炭洗选设施的整改。二是加快能源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清洁能源替代。加快以风能、太阳能、潮汐能、核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替代煤炭能源速度，逐步减少对煤炭能源的依赖。三是加快各领域新能源配套设施建设。可以加大新能源设备使用的政策补贴、扩建新增充（换）电站、完善清洁能源的储存设备建设和交通运输网络建设，最大程度地完成新能源储存，提高新能源使用效率。

做好大气污染的多源防控。源头防控是防治大气污染的重要方法，能够有效降低排放源的排放量，从而减少污染物的释放量。一是深化开展工业源治理。推进钢铁、建材、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等企业生产过程中使用清洁能源，采用清洁生产工艺，配套建设除尘、脱硫、脱硝等装置，减少污染物排放。同时，采用智能监测技术，利用互联网智慧监测设备，对污染物排放及时筛查、监测、辨识、整改，有效提升企业的自动监测能力。二是抓好移动污染源管控。禁止生产、进口或者销售大气污染物排放超过标准的机动车船、非道路移动机械。一方面，对机动车进行排放检验，并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联网，实现检验数据实时共享，对未登记备案机械、“冒黑烟”机械依法查处。另一方面，全面强化工地、道路、露天停车场扬尘管控，定期开展吸尘和冲洗工作，减少地面扬尘。三是聚焦重污染天气应对和区域联防联控。强化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实施重点行业错时轮产，并深化区域联防联控，联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等部门进行常态化巡查，对工业、扬尘、煤炭等污染源头加大巡查频次。

动员全社会参与大气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不仅是政府和企业的事，更与社会公众利益息息相关，需要全社会民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一是加强法律法规普及。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组织要定期宣传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提高全社会民众的大气保护和污染监督意识。二是加大社会宣传力度。通过互联网、微信公众号、电视媒体、学校社区等渠道推广“低碳生活”“绿色出行”等行动，加强对大气污染问题的宣传和教育，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增强公众大气保护的自觉性。三是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可以组织志愿者参与大气污染的监测和防治工作，加强对城市环境的巡查监测。同时，完善以企业和社会捐赠方式参与大气保护的制度，成立大气保护绿色基金，发放大气防治“绿色彩票”，搭建企业和社会公益性捐赠的运行管理平台，不断拓宽大气污染防治的资金来源渠道。

魏才秦用

春秋时期，有“楚才晋用”的典故，说的是楚国朝纲不振，优秀人才投奔他国，特别是被晋国重用。其实，更加令人感叹的是“魏才秦用”。战国时期，商鞅、张仪、范睢都来自于魏国，相继入秦，帮助秦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魏失三才

魏国在战国时代最先崛起，曾是天下英才向往之地。魏文侯治下，群贤毕至，以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为师，以李悝、翟璜为相，以乐羊、吴起为将，文武并进，开创霸业。但魏惠文王沉溺虚名，察举不明，举措失当，人才流失，国势日下。

商鞅生于卫国，在魏国工作多年，算是大半个魏国人。公叔痤身为魏相，深知商鞅之才，却未重用，在临死之前才劝说魏惠王对其委以重任，并建议如不用之必除之。虽然魏王不以为意，但商鞅在职场失意和生命威胁的双重打击下，响应秦孝公《求贤令》的“集结号”，西行入秦。

张仪本为魏国贵胄之后，辗转各国，不为所用，却在秦国找到了新天地，被委以重任，成为秦国历史上第一位相国。范睢和张仪同病相怜，身负奇才，却在魏国无立锥之地，受中大夫须贾、魏相魏齐的迫害，心死投秦。失意之人百折千回之后都投奔秦国，绝非偶然，秦国海纳百川，引天下之士，初现鹰隼试翼之态。

兴秦三策

魏国弃如草芥，秦国得之如宝，求贤若渴，用才不疑。秦孝公的求贤令慷慨激昂，“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六国之士怎能不血脉贲张。商鞅、张仪、范睢入秦之前，都曾命悬一线，在秦国却登上朝堂，与国君坐而论道，指点江山，施展胸中抱负。

后世秦国重臣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对于“魏才秦用”有精辟的论述。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富国强。惠王纳张仪之计，拔三川，并巴蜀，收上郡，取汉中，散六国之众。昭王宏范睢之略，废勋贵，强公室，远交近攻，蚕食诸侯。百余年间，三位来自魏国的杰出战略构架师前后接力，打开了秦国强势崛起的空间。

商鞅献固本之策，编什伍之民，兴农战之法，立国之威信，逐步取得了河西之地的控制权，扭转了秦国长期受魏国压制的局势。张仪献离散之策，巧舌如簧、长袖善舞，疲楚弱楚，破魏楚、齐楚之盟，在秦、楚、齐鼎立格局中赢得先机。范睢献蚕食之策，远交近攻、虎视三晋，连击韩国，以有上党，“得寸则有寸，得尺亦有尺”。魏失三才，皆成秦之栋梁，献兴秦三策，皆中治国肯綮。

唯才是举

秦用函谷雄关挡住了六国之师，但对于六国人才却敞开大门。随着战国竞争不断加剧，秦国对于人才的需求已经不满足于“守株待兔”，而是主动出击，广揽各国人才。最迟至昭襄王中后期，秦国已经建立起组织严密的“猎头”网络，开展搜罗六国人才的专项工作，范睢入秦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秦国使者王稽发现范睢，看似是一件偶然的小概率事件，但仔细分析，却是必然结果。王稽表面上是秦王派遣出访魏国的“谒者”，实际暗中执行招募人才的重大任务。在魏国期间，他时刻高度关注“魏有贤人可与俱西游者乎”，利用每一个机会打探情况。王稽具备职业“猎头”的一切素质，眼光独到，第一次和范睢相见，“语未究，知睢贤”。王稽如获至宝，怕夜长梦多，迅速向魏王辞行，带着范睢一同归秦。

王稽不是昭襄王唯一的特使，秦国的“猎头网络”深入到六国之中，成为一个系统工程：老幼不问，文武全收，唯才是举。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人才流量为秦国带来了发展质量。

客卿之力

秦国有什么魔力，能吸引六国之士？是有高薪，是有豪宅，还是给咸阳户口？或许都有，但都不是关键因素。秦国的“撒手锏”是让人才感受到被充分尊重，找到施展平生抱负的平台。刘玄德三顾茅庐，请出孔明隆中对；昭襄王五跪请贤，得到范睢兴秦策，都可谓旷古美谈。秦国从惠文王时代开始，逐步建立完善客卿制度，虽然曾因郑国渠事件短暂地徘徊，但从整体趋势看，始终保持着高度开放的姿态，整个国家似乎是一个巨大的创业平台，空间巨大、机会开放、规则明确、赏罚分明，能者趋之若鹜。

从秦惠文王至秦始皇的一百余年间，不仅魏才为秦所用，六国贤良皆以入秦为时尚。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楼缓，魏国张仪、范睢，燕国蔡泽都曾担任过秦的相国；客卿金受、寿烛、杜仓、胡伤，或文或武，都曾为秦效力。卫国青年胡伤数年之内由客卿升任中更、成为统率精兵的实权将领，张仪、甘茂实现了出将入相的梦想，这些无疑都有巨大的广告效应。据学者考证，自秦惠文王时代起，有超过半数的秦相来自秦国之外。

秦国把客卿制度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关中虽是秦土，却成为天下英才的共同舞台。多少六国之士怀抱火热之心，把秦国崛起当作自己的事业，报效秦国成为最大的奋斗目标。客卿助秦，外拓疆土，内强君权，平衡公族，为秦国塑造中央政府权威夯实了基础。

“魏才秦用”不过冰山一角，但已可知秦包含宇内之心。秦志在高远，容人之短，用人之长，聚天下之才，皆为可用之人。秦法严明，有功者上，有失者下。大时代风云激荡，秦终胜六国，有赖于虎狼之师，更倚重天下有才之士。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推进农民文化教育

新中国成立伊始，农村百废待兴。农村文盲率高达95%以上，小农意识、不良习气等广泛存在，文化滞后严重影响社会主义建设。为建设一个“文明先进的中国”，毛泽东指出，要大力发展农民文化现代化，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有技术、有全面才能的劳动者”。推进农民文化教育不仅要求实现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现代化，还要对农民的思想观念、文化性格进行现代化的改造，进而提升整个乡村社会的文化地位。

（一）

推进农民文化教育，首先要加强农村基础教育设施、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教育积极贯彻国家办学与集体办学并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据统计，1949年我国小学数量为34.68万所，到1952年增加到52.7万所，增长了51.9%，其中2/3以上新建学校都在村庄。农村小学在校生由新中国成立初期不足2000万发展到1965年的9399.9万，农村基础教育匮乏状况明显好转。为降低文盲率，全国各地农村普遍实行开门办学，广设乡村中学和职业中学，大力开展农村扫盲。各地农村在完善正规化学校教育体制的同时，积极建立不同于城市学制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等农民教育形式。1966年开始，乡村积极开办夜校，近90%的成年人进入夜校学习。学习内容也是注重服务农民生产生活之需要，使从事农村工作的党员干部及农民群众较多地懂得农业，包括土壤学、植物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以服务于科学种田。20世纪50至60年代，全国范围开展的四次大规模农村社会主义文化教育运动，使得农村文盲率大幅降低，一些地区还形成了群众性学习高潮。农民中青壮年文盲率大大降低，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80%下降到 1964年的48.4%。基于1966年毛泽东作出的“五七指示”，农村基层当时创办了很多“五七”大学，这种全能学校进一步拓展了农民文化教育及技能培训的平台，农村文化及职业教育水平大大提高。

（二）

推进农民文化教育，还要培养农民拥有良好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及道德修养。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加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基层文化队伍建设的同时，通过大力开展农村群众性文化活动，让农民大众成为新文化的参与者和创造者。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许多民间手工艺都是“我们民族好的东西”“一万年也不要搞掉”，中国新诗歌的发展出路“第一条是民歌”。在此指引下，各地文艺工作者不断发扬光大春联、年画、戏曲等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加快推广广播、电影等群众喜闻乐见的现代文化。1953年，全国乡村有2455个文化馆、4122个文化站、2267个艺术表演团体和3833个电影放映单位，丰富多彩的板报、报告讲演、故事会、农民文化节以及声情并茂的广播、电影等让广大农民逐渐拥有了现代的公共文化生活。1958年，全国范围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歌运动”，农民们积极参与其中并表达出自己的心声，出现“如今唱歌用箩装，千箩万箩堆满仓”的生动局面。这些民歌是农民群众自我创作的艺术品，同时也成为农民在田间地头生产的鼓舞诗歌。虽然这些群众性文化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比较粗糙，但农民群众在自己熟悉的文化语境中实现了自我教育，改掉了不良习气，增强了自信心、自豪感，农民精神面貌大为改观。

（三）

推进农民文化教育，最终要靠提振农民“精气神”，积极构建社会主义的主流乡村文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们停留在传统的“发家致富”的微观认知上，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等宏观图景不够理解，也缺乏积极性。为此，20世纪50至60年代掀起了“比学赶帮”的热潮，若干先进乡村典型闻名全国。河南林县修建红旗渠抗干旱，山西昔阳县大寨村把穷山区打造成“层层梯田米粮川”，山东莒南县厉家寨的“愚公移山”精神更是彰显了社会主义农民的顽强坚韧、乐观向上的形象。与此同时，《红旗谱》《创业史》等反映农村新秩序、新气象的文学作品广为传颂。《创业史》中的主人公梁生宝作为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进程中经典的农民形象，不仅鼓舞着乡村群众，更鼓舞着全社会，各领域支援农业发展逐渐成为社会共识。《人民日报》于1958年1月发出“组织技术大军到农村去”的号召。1960年，工、商、学、兵各部门开展技术下乡、支援春耕活动，仅四川省志愿者就有100万人。长期处于小农生产模式影响下的农民群众，在这种感人的社会主义劳动互助热潮中、在运用农业机械转变农业生产方式的爱国增产过程中，体会到了自己在国家中的存在感，逐渐培养起了主体观念、集体观念和科技观念，劳动热情高涨。在大型文献《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各种体现着憨厚质朴、吃苦耐劳等传统农耕文化精神的农民先进典型层出不穷。这些作品的出现使得农民成为鲜活的主流形象，乡村也随之从传统历史叙事的边缘中走出来。这一时期，毛泽东还专门写诗称赞乡村旧貌换新颜，如《七律二首·送瘟神》《七律·到韶山》，歌颂的就是消灭困扰乡村已久的血吸虫病、家乡发生巨变的感人事迹。广大农民的能动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呈现出了不等不靠、自力更生的时代价值。乡村因此成为寄托着社会主义奋斗者美好期许的理想热土。

盐东战役

华中我军转入战略进攻首夺中心城市

盐东战役，又称叶挺城战役（1946年4月25日，苏皖边区政府为纪念新四军军长叶挺，决定改盐城县为叶挺县），是华东野战军一部，于1947年8月6日至12日，在江苏盐城、东台地区进行的城市攻坚战。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7000余人，攻克据点10余处，使苏中、苏北解放区连成一片，有力支援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挺进大别山及华东野战军主力在山东的作战。

从战略全局谋划战役

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组织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947年7至8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亦称刘邓野战军或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向大别山进击；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主力组成外线兵团（亦称陈粟野战军或陈粟大军）挺进鲁西南；陈赓、谢富治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亦称陈谢集团或陈谢大军）挺进豫西。三路大军成品字形阵势，互相配合，机动歼敌。另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和西北野战军继续在山东和陕北战场钳制国民党军，策应三路大军的中央突破。

国民党军在组织中原防御和胶东“九月攻势”的同时，仍集中20多个旅的正规军，在大量反动武装的配合下，依托占据的各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采取“轮番扫荡”“分区清剿”“梳篦搜索”等方式，进一步对苏皖边区和山东占领区展开近似疯狂的“清剿”和“扫荡”。为策应刘邓、陈粟大军挺进中原，切断国民党军进攻山东的补给线，支援山东战场的内线歼敌，同时打破国民党军分割苏中、苏北解放区的局面。坚持在苏中、苏北的华东野战军第11、第12纵队，会同苏北军区第5军分区、苏中军区第2军分区部队，利用国民党军驻苏北、苏中部队外调，其他部队调整部署尚未完成，兵力分散、防守力量相对空虚之际，向守备薄弱的盐城、东台地区国民党军发起攻击。

肃清外围，兵临城下

盐城位于（南）通（赣）榆公路中段，苏中、苏北交界处，是连接苏鲁地区的主要交通枢纽之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一直是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1946年12月，华东野战军主力北上山东后，盐城陷入敌手，横插在苏中、苏北两大解放区之间，把华中根据地截为两块。国民党军占领盐城后，将其建成在苏北的重要补给基地，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守敌为郝鹏举第42集团军第1师残部2个团及保安团、还乡团等地方反动武装近万人。战前，为了统一指挥，成立了盐东战役前线指挥部，由第11纵队兼苏中军区司令员管文蔚任总指挥，第12纵队兼苏北军区司令员陈庆先任副总指挥。经过隐蔽仔细的侦察和判断之后制订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决定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扫清盐城以南的伍佑、大团、便仓、南洋岸等地外围据点；第二阶段包围并攻克盐城，全歼守敌。

8月6日晚，第11纵队从南面突然包围伍佑、便仓、大团等据点，第12纵队从北面包围南洋岸等据点，战至7日，伍佑、大团、便仓、南洋岸等敌据点相继被我军攻克，全歼守敌。10日晚，第11纵队及苏中军区第2军分区部队从东南、西南，第12纵队及苏北军区第5军分区部队从东北、西北向盐城逼近，进入攻击阵地。至11日拂晓，全部占领了城外的零星据点，被击溃的敌人急忙退缩于城中，并将所有通向城里的桥梁全部拆毁。我军即用火力压制敌人，突击架桥，并进行总攻前的各项准备。至此，战役第一阶段任务圆满完成。为鼓舞士气，前线指挥部发布第3号政治命令：“叶挺城战役务必夺取全胜，哪个团首先攻进城，首先完成突破任务，同时支援部队好，战场纪律好，就授予哪个团以‘叶挺部队’的光荣称号，并授予表现突出的个人‘叶挺勇士’的光荣称号。”号召参战部队全体指战员英勇作战，积极开展杀敌立功的竞赛活动。

一往无前，直捣敌巢

12日凌晨，总攻开始了。炮兵集中火力猛轰敌人的防御工事，敌地堡等大部分被摧毁，城墙也被打塌了几个大的缺口。我各部队所有轻、重机枪以强大的火力压制敌人，攻城突击部队从东、南、西、北四面发起猛攻。在城东方向，担任攻打东门突击任务的第11纵队第31旅第92团1营3连，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迅速通过浮桥，朝城墙直扑过去。

冲在最前面的5班突遭敌密集机枪火力压制，无法动弹。在这紧要关头，6班副班长陈和进挺身而出，顺着一处坍塌成斜坡的城墙，越过障碍，快速登上城头，成为此次战役登城第一人。城墙上的守敌被陈和进的勇猛行动惊得目瞪口呆，乱成一团。陈和进乘机向敌人扔去一枚手榴弹，紧接着开枪射击，将1名敌排长和1名敌班长打伤在地，其余的敌人见状向城内仓皇逃窜。陈和进紧随其后追歼逃敌，途中不幸被敌人击中倒下，班里的战友跑过来搀扶，陈和进忍着剧痛吃力地说道：“不要管我，你们快去消灭敌人，冲啊!”说完，咬紧牙关又向前爬去，1米，2米，3米……在他身后留下一道长长的血迹，直至壮烈牺牲。在陈和进英雄壮举的激励下，突击连和后续部队的指战员们奋勇向前，以摧枯拉朽之势从东门一直打到西门，迅速割裂了敌人的防御体系。

城西北方向，攻打西门的突击队由第12纵队第35旅第103团1营2连31名指战员组成，在队长高简银副连长指挥带领下，奋勇冲过80米长的开阔地和壕沟，涉过两丈多宽、齐胸深的护城河，迅速冲到城墙下，向城头甩出一排排手榴弹，炸得敌人晕头转向，随即架设云梯攀登城墙。排长马标途中腿部受伤，仍旧咬紧牙关，第一个跳下护城河，第一个爬上城头，拖着受伤的右腿，仅用4分钟就将红旗插上了城头。战斗中不幸被敌手榴弹炸伤，仍不忘鼓励大家杀敌立功，最后光荣牺牲。突击队长高简银被敌人连人带梯掀进护城河，他忍着剧痛爬上河岸，重新攀上云梯，带领突击队员冲上去。在和数十倍的敌人反复肉搏中，突击队31人最后只剩下6人，其中还有4名伤员，却牢牢守住了突破口。

与此同时，其他各部队相继突破敌城防攻入城内，与敌人展开激烈巷战，将守军大部歼灭，残敌退缩至盐城中学负隅顽抗，第11、第12纵队各1个团再次发起猛攻。在我军强大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残敌被迫缴械投降。至此，我军仅用了10余个小时，就一举拿下了这座江苏境内赫赫有名的城池。战后，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总部发来贺电，嘉奖盐东战役有功部队和有功人员。第92、第103团分别被第11、第12纵队授予“叶挺部队”光荣称号，成为我军历史上仅有的两支以“北伐名将”叶挺的名字作为荣誉称号授予的团级部队。

古代做官的人一生都读书

历朝历代的官员大多年幼时就开始学习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寒窗苦读，养成了长年读书的习惯，做了官以后大多不改其习惯，勤于读书，即使在休假中、退休后也依然手不释卷。总之，读书是古代官场的主流。

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时期，品评官员往往看其出身门第、识其谈吐风度、论其书法辞章、讲究名望口碑等，有了这些不成文的尺度，官场上读书、作文蔚成风气，不读书之辈很难在官场里立足和生存。

历代皇帝用人导向，以及偃武修文、重用儒生的制度建设，都要求做官必须读书。汉武帝时考核提拔官吏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能否通达儒学。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治的儒生备受器重。汉朝标榜以孝治天下，因此，汉代官员争相阅读《孝经》。据《太平御览》载：“故汉制天下皆诵《孝经》，选吏则举孝廉，尽以孝为务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官员自然也就将学习《孝经》奉为必修课。

盛唐时期好学之风遍及朝野，官员士子对读书极为重视。唐太宗常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告诫百官多读史书。韩愈说，“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中唐以敢于进谏出名的阳诚因家贫无书读，便去做了抄书吏，昼夜不出门，“经六年，乃无所不通”。

公元990年，宋太宗更是向各路官员遍赐《九经》，赵普、范仲淹等宋代名宦几乎个个都是勤学苦读的典范。宋太宗给赵普撰《神道碑》，称其“及至晚岁，酷爱读书，经史百家常存几案，强记默识，经目谙心，硕学老儒，宛有不及”。《宋史》对宋代官员的读书之风给予了高度评价：“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

导向和榜样的力量，利益和爱好的结合，让古代身在官场的人，一生都放不下书。